

西 欧 哲 学 史

〔苏联〕亚历山大洛夫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西 欧 哲 学 史

〔苏联〕亚历山大洛夫 著

王永江 颜品忠 汤侠声等 译
王永江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9年·北京

Г. Ф.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ИСТОРИЯ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46

根据苏联科学院莫斯科 1946 年增订第 2 版译出

2016/07
XITUO ZHÉXUESHI

西 欧 哲 学 史

〔苏联〕亚历山大洛夫 著

王永江 颜品忠 汤侠声等 译

王永江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8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614-7/B·88

1989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76 千

印数 2,800 册 印张 15 3/4

定价：5.50元

中译本序

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于 1945 年出版，1946 年出第二版，至今已有 40 年了。在此期间，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学术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欧哲学史》，似乎没有必要再将它翻译出版了。然而，亚历山大洛夫这本书不是一本普通的著作，它在战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过特殊的经历。1947 年苏联哲学界对这本书的批判，日丹诺夫对这次讨论会的总结发言，不仅对苏联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我国哲学界也直接接受了它的左右，其中的是非直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我国哲学史界 1978 年在安徽芜湖召开第一次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会上有些同志就提出了日丹诺夫给哲学史下的定义是否正确的问题；1979 年在北京专门召开了一次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会；1980—1981 年又在报刊上开展了对唯心主义评价问题的讨论。这些情况实际上都和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以及 1947 年关于《西欧哲学史》的讨论会有关，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西欧哲学史》的内容进行的。然而，《西欧哲学史》这本书的内容究竟如何，日丹诺夫的批评是否符合这本书的实际，却无从对证，我国根本没有这本书。在苏联，自 1947 年批判之后，此书也被列为禁书，我们许多留苏的同志也不曾看见过。人们所看到的只是日丹诺夫的讲话，听的是一面之词。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弄清是非曲直，就要看正反两方面的材料。有比较才能鉴别。这是我们翻译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当然，就《西欧哲学史》本身来说，它也有值得借鉴的价值。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界第一本试图用

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西欧哲学史教科书。从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史的发展来说，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

《西欧哲学史》是作者于 1933—1944 年在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历史哲学文学院和高级党校教授西方哲学史课程过程中编写而成的，先后花了十二年时间。它是当时苏联各高等院校、党的教育网以及研究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的教科书^①。因此，它的读者不仅有大学生，而且也有党的高级干部和哲学专业理论工作者。可以说，《西欧哲学史》在当时是一部理论界尽人皆知的著作。它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扬，被誉为“一部卓越的西欧哲学史著作”和“一部科学的哲学史著作”^②。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曾以哲学家集体的名义，建议给《西欧哲学史》颁发斯大林奖金。他们认为，《西欧哲学史》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对哲学史作出了严整而有系统的叙述，根据原著进行分析，具有高度的理论水平，而且内容丰富；它论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提出了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哲学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并对哲学史的分期问题和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

然而，当时苏共中央不同意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评价，并责令哲学所对《西欧哲学史》进行讨论。哲学所于 1947 年 1 月召开了《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可是苏共中央认为这次会议未能按照要求去做，在讨论的组织和方法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中央委员会决定组织一次新的讨论”^③。

① 参见 M. B. 埃姆金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哲学问题》1947 年俄文版第 1 期第 6 页。

② 《苏联书籍》1946 年第 5 期，《苏联科学通报》第 10 期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第 13—14 期。

③ 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开幕词，见《哲学问题》杂志 1947 年第 1 期第 1 页。

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1947年6月24日亲自主持召开了苏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哲学史讨论会。但在开会之前苏联哲学界并未感到有召开这次会议的必要。讨论会的方式、内容和宗旨，都使他们感到震惊，用《哲学问题》编者的话说，这次讨论会震撼了苏联哲学界的广大阶层^①。因为这次讨论会不但使《西欧哲学史》由一本好书突然变成了一本坏书，而且使讨论的问题不只局限于哲学史的范围，而是指出了哲学战线状况的一般性问题，直接关系到苏联哲学工作的方针、政策，使讨论会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性质。

这样看来，召开这次讨论会的真正原因，并非象日丹诺夫所说的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对讨论会的组织和讨论的方法不满意，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除了同地主资产阶级的宗教神秘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的斗争，还经历了对阿克雪里罗得等的机械论、布哈林的平衡论和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运动。这些批判运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虽有一定的根据和理由，甚至有的也是必要的，但往往以政治上的考虑代替学术上的讨论。而且当一场批判运动结束之后，接着又酝酿一场新的斗争。1934年对德波林及其学派批判之后不久，就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哲学史方面来了。因为当时认为德波林最主要的错误之一，是把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混同起来，抬高了黑格尔而贬低了马克思，犯了所谓“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错误。因而批判黑格尔，划清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界限就成为哲学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哲学界对黑格尔的评价一般还是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1943年由亚历山大洛夫、贝霍夫斯基、米丁和尤金主编的《哲学史》第三卷，就曾因没有足够地批判德国唯心主义

^① 参见《哲学问题》杂志1947年第1期，第1页。

及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德国哲学家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反动社会政治方面，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利用并鼓吹这些思想的年代，“没有始终一贯地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根本对立”，而受到了批评^①。然而，1945 年出版的《西欧哲学史》却仍无变化，而这种情况在哲学界不但未引起重视，受到批判，反而得到赞扬和推崇，并于 1946 年在未作重大修改的情况下又出了第二版，这就不能不引起苏共中央的干预。

从另一方面看，理论上的“左”倾则是更深刻的原因。斯大林早在 1929 年，就强调“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②。他要求哲学理论直接为政治服务，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的，但斯大林认为随着革命的胜利和深化，阶级斗争将越趋尖锐化，把哲学战线上存在的一些学术和理论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要求在哲学问题上不要停留在哲学体系的无关紧要的叙述上，而要从每个时代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即从政治上考虑每个哲学体系和哲学上的斗争，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比较符合实际地评述各种哲学体系的实际价值。为此，就提出了所谓要创造性地对待哲学问题，克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死读书的现象；要敢于向前推进而不停留在过去的阶段上，不要用过时的引文去解决新的问题，而要对新的材料和新的历史给予相应的新的回答。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上是要人们不必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去研究哲学史。《西欧哲学史》一书的讨论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的，是贯彻这种思想意图的一个具体步骤和表现。

日丹诺夫在他的总结发言中把这种思想意图具体化了，提出

① 参见敦尼克主编：《哲学史》第六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65—466 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0 页。

了一系列哲学史方法论原则问题，对《西欧哲学史》作了全盘的否定，指责《西欧哲学史》既没有总的确切的定义，缺乏科学性和创造性，又缺乏党性原则，犯了客观主义，美化剥削阶级思想家的错误。总之，这是一本很坏的教科书，“需要根本改造”^①。然而，日丹诺夫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却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

二

《西欧哲学史》固然不象讨论会之前所说的那样完满无缺，但也不象日丹诺夫所批评的那样一无是处。只要翻阅一下原书就可以看出，亚历山大洛夫是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西欧哲学史的各种问题的。

首先，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日丹诺夫批评亚历山大洛夫没有给哲学史下一个总的科学的定义。但实际上亚历山大洛夫是试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哲学史的论述的精神来为哲学史下定义的。他根据列宁的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②的观点，提出了哲学史是“人对周围宇宙的知识之前进、上升、发展的历史”，是“哲学思维的历史”，“也是许多现代思想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同时根据恩格斯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列宁的哲学的党性原则的观点，又提出哲学史是“在哲学上两个基本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研究认识的历史”，它“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人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反映”等等^③。

亚历山大洛夫的这些说法固然有些零碎。但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是一致的，而且指出了哲学史这门科学的特殊性。

① 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讨论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下同），第27页。

② 把哲学史说成是“整个认识的历史”（着重点为引者所加），是误排，但说哲学史也是认识的历史则并无错误。

③ 以上引文均见本书第5、6、10、17页，即1946年俄文版第8、9、14页。

如果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锻炼理论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①，那么哲学史主要应该是关于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人们从各种不同哲学思想体系中总结其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这样，哲学史就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编写。既可以写成综合性的通史，也可以写成断代史和范畴发展史，甚至也可以写成某一哲学家的评传或思想体系的研究。

日丹诺夫认为，“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末，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②下这个定义的动机可能是好的，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重要地位，但却显然具有目的论色彩，而且把哲学史只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这就把内容丰富复杂的哲学发展简单化了。事实上哲学史不单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还有二元论和不可知论、唯理论和经验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种情况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存在，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仍然存在，并变得更加五花八门，今后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实际上，日丹诺夫的定义在苏联也从未遵循过，而且还遭到了批评。五十年代开始时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哲学史的对象扩大化，把哲学史看作是“关于整个世界观点的体系”，是“一幅世界的科学的图画”，即整个精神文化史^③；另一种则把哲学史归结为认识论和逻辑，也就是归结为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科学。后来这两种观点都受到了批评。1957年，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提出“科学哲学史的对象是：社会发展各阶段上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史，首先是哲学的基本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孕育、形成、发展以及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② 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第4—5页。

③ 参见亚历山大洛夫主编：《辩证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页。

们相互间的斗争的历史”。而且“也包括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孕育、形成、发展以及它们相互之间斗争的历史”^①。这个定义也明显的和日丹诺夫的定义不同了。1959年约夫楚克又作了进一步发挥，强调哲学史的对象是有存在和认识的一般基础(规律)的各种哲学概念的历史发展；包括各个不同哲学体系的思维方法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等等。他直接批评了日丹诺夫的定义^②。到了七十年代，有人提出哲学史除了是两个基本哲学派别形成和斗争的历史，也是“人对世界和自身存在的理论认识的历史”^③。

日丹诺夫在哲学史的对象问题上作文章，主要是要指责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没有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见，所谓党性原则是指哲学史上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派别。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但这并非意味着要否定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其实，亚历山大洛夫并未忽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他只不过是对各种哲学(其中包括唯心主义哲学)都进行了比较客观的介绍和分析，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任意加以剪裁。这对一本教科书来说应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可以使读者看清每位哲学家思想的本来面目，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实际作用来评价一种哲学体系的意义。这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是什么客观主义。应该说，这是《西欧哲学史》的一大优点，根本不是什么缺乏党性的表现。

例如，《西欧哲学史》在介绍和批判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观点的

① 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3页。

② 《哲学史的若干方法论问题》，《哲学问题》1959年第11期，参见《学术译丛》1960年第1期。

③ 格里戈里扬：《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1973年俄文版，第41页，中译本第26页。

同时，也指出“柏拉图的体系也有个别的积极因素”，即他的辩证法^①；对亚里士多德除了正面肯定他的哲学思想，又侧重批判了他的唯物主义不彻底性；在批判奥古斯丁神学的荒谬性时，也指出它的内在矛盾，表明即使是基督教的狂热分子，在他认识世界时也不能完全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在讲唯名论和实在论之间的斗争已包含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派别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时，还指出实在论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实在论也会给宗教带来危险，因为实在论和宗教终究有一定的差别，等等。

亚历山大洛夫的分析是否准确恰当，这是可以讨论的，但绝不能说这是美化、吹捧剥削阶级、“对所有一切旧哲学都找到了机会说几句恭维话。对于名声越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也就恭维得越厉害”，成为“资产阶级哲学历史家的俘虏”，对资产阶级献媚，夸大他们的功劳，剥夺我们哲学的战斗进攻精神，脱离了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和党性^②。

事实上，日丹诺夫本人倒有脱离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来谈问题的倾向。例如，他完全反对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对者，反对把他们的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愿望看作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反映，而把他们都统统归之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范畴。他甚至把傅立叶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看作是社会哲学的最伟大的成绩、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样一种说法，也看作是客观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斥之为“连一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影子都没有”^③。

其实，关于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定论。恩格斯明确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是“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

① 《西欧哲学史》第72页，见本书第68页。

②③ 参见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第16页。

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的“理论表现”^①。列宁说：“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象征、表象和先声”^②。关于傅立叶的社会发展理论，恩格斯也明确说过，“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③，“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按照自己的看法想象未来的”^④。

日丹诺夫在这里确实连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都没有了。如果不是无知，那就是有意歪曲。这种把代表早期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统统划到资产阶级一边，推到对立方面去的做法，实质上是极左思想的表现。

三

与哲学党性有关的问题，还有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也是日丹诺夫批判《西欧哲学史》的重要问题。

《西欧哲学史》的确比较注意哲学思想发展的继承性，力图把每一种哲学体系都放在一定历史的链条上，在上下左右的关系中阐述它的形成和发展。作者把欧洲各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比如，作者指出，洛克哲学既是继承了英国经验论的传统，又是在同法国笛卡儿的天赋观念的斗争中形成的。这就使欧洲哲学史成为一部有连贯性、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而不是哲学家们思想的简单汇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哲学的这种发展中形成的。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才易于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是在继承以往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完成的，没有继承，也就无所谓变革。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6页。

② 列宁：《两种乌托邦》，载《列宁全集》第18卷，第352页。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57—258页。

④ 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前言和结束语》，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58页。

日丹诺夫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批评亚历山大洛夫“把哲学的历史当做了各种哲学派别的逐渐更替”。他认为在无产阶级世界观产生之后，在“旧时期的哲学只是个别人的事情，只是少数哲学家及其门徒所组织成的哲学学派专有的财产。这些人都是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人民，与人民毫不相干的”^①。日丹诺夫的这种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每一种哲学都是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意识的理论表现，绝不是个别人，少数哲学家的事情，而且也绝不是彼此孤立、毫无联系的东西。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继承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向申明自己是前人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每一代人都是“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②。马克思在谈到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时曾作了一个十分中肯的比喻，说“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引者），正如现代化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③。恩格斯说：“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感到骄傲”^④。列宁也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⑤。列宁还强调指出：“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了人

① 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第10页。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③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7页。

④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8页。

⑤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选集》中文第二版，第2卷，第441—442页。

类全部发展的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后，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①而且“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充分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全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学说的直接继续”^②。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固步自封的体系。它之所以强大有力，就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而是继承了人类两千多年来一切优秀的哲学成果，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地加以补充和发展。

当然，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继承是批判的继承，并不是不分精华与糟粕的兼容并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种批判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完全否定”或简单抛弃。即使对那些反动哲学体系的批判，也需要说理，需要分析。戴帽子、打棍子，是不能算作批判的。如鲁迅所说，谩骂决不是战斗。

日丹诺夫对亚历山大洛夫的批判为全盘否定文化遗产，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如果说《西欧哲学史》在继承问题上有不足之处的话，那决不是讲继承讲得多了，而是讲得还不够，对思想、概念、范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描绘得还不够清楚，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

①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载《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348页。

②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四

和继承问题直接有关的，是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问题。这是讨论会的中心之一，也是日丹诺夫批评的重点之一。

亚历山大洛夫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来阐述德国古典哲学的，他对几位古典哲学家的主要观点作了分析，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进步方面，指出了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进步作用。作者指出，这种进步作用不仅指他们的辩证法，而且也包括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倾向：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是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是，作者在分析他们的学说的某些保守方面时却常常言过其实，甚至以“反动”论之。例如，亚历山大洛夫说：“康德学说中的反动特征，在他的世界观中占据愈来愈大的地位”，“这种学说排除了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使康德的‘实践理性’活动成为彻头彻尾反动的唯心主义学说”^①，康德的伦理道德观是“反映最反动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和伦理要求”^②；费希特主要是制定了完整的道德体系，这是反动的；谢林割断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联系并与普鲁士的反动势力妥协，是他哲学观点发生改变的政治前提，“从这时期，谢林已是一个‘精神上死亡了’的人^③”；黑格尔的哲学中也包含着保守和反动的方面^④，如此等等。

亚历山大洛夫的这种评价清楚地表明他是受了当时苏联流行的一些过左的说法的影响。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未说过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是反动的，而只是说他们具有保守的方面：康德的善良意志符合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

① 见本书，第354页。

② 见本书，第355页。

③ 见本书，第373页。

④ 参见本书，第386页。

况^①；费希特的“自我”是纯粹的利己主义^②；谢林是一位“基督教的哲学家，”“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③，用宗教神学“满足普鲁士国王的需要”，黑格尔出于体系的内部需要使本来“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④，等等。

尽管如此，日丹诺夫仍然不满意，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他认为这是“把敌对哲学的斗争描写成黑格尔本身内在的反动原则与进步原则的斗争。这种证明方法不仅是客观主义的折衷论而且是替黑格尔粉饰。因为这样就是想证明在黑格尔哲学中的进步方面与反动方面是一样多的”^⑤。日丹诺夫的讲话一开始就声明，他是要靠引证经典作家的话作为罗盘针的，可是在这里他却把“罗盘针”完全抛在一边了。他所根据的是斯大林关于“德国古典哲学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的反动’”^⑥的论断。按照这个论断，不可避免地要得出全盘否定德国唯心主义的结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在他（指斯大林——引者）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全盘否定了”^⑦。斯大林和日丹诺夫都很清楚，这样做是违背马恩列的观点的，因此，他们就提出所谓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以便迫使人们“抛弃那些过时的原理”。这样，苏联哲学界就不能不走上虚无主义的道路。有人甚至提出，不仅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具有保守反动的性质，而且他的辩证法也是德国资产阶级中一部分反动分子的世界观，是普鲁士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1—212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页。

③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70年版，第337—338页。

④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9页。

⑤ 日丹诺夫：《在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第17页。

⑥ 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六卷上册，第466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容克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这种评价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我们在黑格尔著作中看到，他虽然反对唯物主义，但并不简单地把它说成是谬误。他认为如果把唯物主义与二元论相比，唯物主义是一个进步。他在《精神哲学》中说，“应该承认唯物主义的奋发精神是力图超出两种不同的存在的二元论的界限”，而真理的世界也是要扬弃这种原始统一的分离的^①。而且黑格尔很钦佩法国哲学中那种反抗现状，反对信仰，反对一切权威势力的惊人魄力。他承认“法国人有一种深刻的、无所不包的哲学要求，与英国人和苏格兰人完全两样，甚至与德国人也不一样，他们是十分生动活泼的：这是一种对于一切事物的普遍的、具体的观点，完全不依靠任何权威，也不依靠任何抽象的形式而上学。他们的方法是从表象、从心情去发挥；这是一种伟大的看法，永远着眼于全体，并且力求保持和获得全体。”^②对于法国大革命，黑格尔不但青年时期对它表示欢迎，而且在年过半百之后仍然肯定它所起的作用，称赞它摧毁了一切权威。

在政治上黑格尔虽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革命的、进步的。就以当时被看作替普鲁士王朝辩护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句名言来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本身就包含着革命的意义，而且按照海涅的说法黑格尔本人已了解自己这个哲学命题的革命意义，即它的真正意思是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现实的东西如果不合理也必将被扬弃^③。所以，应该说黑格尔的保守性只在于他不敢把他的这种真正的意图公开表示出来，而只是偷偷地向人暗示，在公开场合却

① 黑格尔：《精神哲学》；《黑格尔全集》格罗克纳版第10卷，第59、60页，参见黑格尔：《哲学百科全书》第3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62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20页。

③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61页。